

论《少年》中父子错位 和“偶合家庭”现象的精神内因^{*}

万海松

摘要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少年》既是一部描述父与子主题的长篇小说,也是一篇关于少年阿尔卡季精神成长的别样《忏悔录》,更是一个书写“宗教与人生”思想的重要文本。从精神伦理的角度来看,小说中父子角色的错位和“偶合家庭”的现象,其产生的内在根源在于缺乏最基本的精神认同,即共同的道德规范和对上帝的敬畏。而且,从成长小说的词源学角度分析和对“宗教与人生”的思想书写的考察可见,《少年》重在彰显俄国东正教精神在失去与复得之间追寻与探求的思想史意义。

关键词 陀思妥耶夫斯基《少年》父子错位 “偶合家庭” 成长小说

DOI:10.16238/j.cnki.rla.2021.02.004

关于《少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在 1876 年的文章《未来的长篇小说。再谈“偶合家庭”》里追溯其创作动机时认为,这部小说差一点要写成自己的《父与子》。^①“一年半之前,尼古拉·阿列克谢耶维奇·涅克拉索夫邀我为《祖国纪事》杂志写小说时,我几乎就动手写我的《父与子》,但幸亏我搁了笔:我还没有做好准备。当时我只是写了《少年》——这是实现我的构思的第一次尝试。”^[1](176-177)]可以说,《少年》作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半部《父与子》、独特的《忏悔录》,既是一部别样的关于父与子的关系史,一部关于少年精神成长的心灵史,也是一个书写“宗教与人生”思想的重要文本。

从作家对少年阿尔卡季的年龄界定来看,小说与《圣经》中关于浪子、探索善恶、忏悔回归等情节的影响不无关系。苏联科学院版《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的编注者认为,作家把获得对善恶的理解确定在二十岁

左右,故而以此确定了少年的年龄:“这种观点也许多少来源于《旧约全书》中的类似分野。《旧约全书》中把人的成熟标志跟获得对善恶的理解联系在一起。”^[2](761)]而巴赫金则认为,《少年》中的阿尔卡季应该是一个《圣徒传》式的人物。^[3](283)]

一、半部《父与子》、别样《忏悔录》

《少年》作为半部《父与子》的特点,主要体现为父与子的矛盾,具体就是子辈对父辈的不满,尤其反映在主人公用现代西方文明而不是俄国农奴制之前的世俗标准来衡量父辈的德行。阿尔卡季对生父韦尔西洛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东正教与俄罗斯文学”(15ZDB092)和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陀思妥耶夫斯基书信文本研究”(19BWW042)阶段性成果。

^① 《少年》发表于 1875 年,而屠格涅夫的《父与子》则发表于 1862 年。

夫虽受过高等教育但行事方式不文明非常不满,因为后者不愿明媒正娶娶自己的生母,所以导致自己以私生子的身份无法在文明社会立足的尴尬处境,由此对生父及其生活和行事方式心生怨恨。

阿尔卡季指责自己生父在道德上没有高于出身农奴的母亲,显示出具有高贵出身的父辈在德行上的堕落。“即使她没有得到启蒙,在道德上也总是远远高出您,请原谅我这么说,然而……她不过是一个道德无限高尚、却毫无生气的人。只有韦尔西洛夫一个人在生气勃勃地活着,而他周围的其他人,所有跟他相关的人,全都在半死不活地过日子,他们顺从一个必要的前提:有幸用自己的精力和心血去供养他。可是从前她不也是生气勃勃的吗?您不是也爱上了她身上的某种朝气吗?从前她不也是个活生生的女人吗?”^{[4](164)}在一次貌似推心置腹的父子谈话中,作为生父的韦尔西洛夫竟然说出“俄国女人——从来不是真正的女人”这样的话,在遭到儿子驳斥后,他却嘲笑儿子是斯拉夫派。^{[4](164)}

父辈与子辈的隔阂和误解似乎是注定的。韦尔西洛夫有过几次自以为是的“人道主义精神”的行善举动,譬如一次对一个深陷困境、登报想要靠做家庭教师来谋生的女孩奥莉娅的帮助,让女孩误以为是有钱的老爷蓄意用这种方式来侮辱贫困的处女,由此加重了女孩的忧郁和焦虑,间接导致女孩不堪忍受而自杀。他在追悔时不禁感叹自己与年轻一代之间的鸿沟:“不,今后我再也不会去管闲事……不会去‘做善事’了……我生平管闲事就管了这么一次!我原以为自己还没有落伍,自己还能理解现代青年。是啊,我们老一辈人几乎还没有成熟就衰老了。顺便说说,确实有许多当代人,依旧在想当然地自认为是年轻的一代,就因为昨天

他们还是这样的一代,然而他们却没有发现自己已被时代淘汰了。”^{[4](238)}

《少年》作为“半部”《父与子》的特点,也体现为韦尔西洛夫和阿尔卡季父子之间存在明显的角色互换和义务与责任的严重错位。身为父亲的韦尔西洛夫一出场俨然一个放浪不羁的“浪子”形象,而作为刚刚走出童年、正迈向少年的儿子阿尔卡季,却一开始就显得极其世故,尽管有些地方仍不免流露出孩子气。阿尔卡季似乎一直在窥伺、观察生父的种种言行,有时忍不住要引导其父的在他看来不端的行为举止,有时又会跳出来为其父的言行进行辩护。当他得知自己在奥莉娅自杀一事上误解了韦尔西洛夫后,高兴地对好友瓦辛说自己的父亲“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4](244)}阿尔卡季这话,原是路加福音中的老父亲所念叨的归家浪子,在这里却角色对调,竟然被儿子用来说亲生父亲,可见父与子的角色错位到了何种程度:父亲作为一个成年人竟然在挥霍本该属于子辈的青春和任性,犯下了种种不属于这个年纪、本应避免的诸多人生错误,而子辈却俨然在行使父亲的责任,处处“看管”着孩子气的父亲,为他担忧、想替他分忧。当阿尔卡季像大人一样做事、花钱的时候,作为父亲的韦尔西洛夫竟然不闻不问,宛如一个是非不懂的孩子。有时连儿子都感到莫名其妙:“既然他如此爱我,为什么在我可耻地沉沦之时不来阻止我呢?当时只要他说一句话,我也许就能克制住自己。”^{[4](278-279)}相比之下,作为子辈的阿尔卡季跟作为祖辈的索科利斯基老公爵反倒是更亲近,尽管祖辈也不乏保守、虚伪等缺点,但这种“隔代亲”里有一种真诚和坦率,似乎纯粹是为了反衬父子两辈人的角色错位。

“日内瓦思想”和“隐遁到北美(美国)的思想”是《少年》中父子隔阂的典型表现

形态,这两者都不是俄国的本土思想,却在俄国语境中发生着严重冲突。父辈沾染的是“日内瓦思想”,按照韦尔西洛夫的说法:“日内瓦思想——这是一种没有基督的美德,我的朋友,这是现代思想,或者最好说是一切现代文明的思想。”^{[4](283)}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看来,“日内瓦思想”的本义是追求人民在经济上的平等、共同的富裕,但付出的代价则是基督教精神和传统伦理的丧失。而作为处于冲动和叛逆期的少年的子辈,却非常容易被“北美思想”所刺激。正如韦尔西洛夫为阿尔卡季所担心的:“你现在想要的恰恰是轰轰烈烈的生活,想点燃什么,粉碎什么,想凌驾于整个俄国之上,叱咤风云,让人又害怕又敬佩,而自己则隐遁到北美合众国去。”^{[4](284)}韦尔西洛夫所说的“点燃”俄国、然后“隐遁”北美的想法,就是青年学生喜欢采用的暴力抗议后流亡他国的“北美思想”,这是父辈绝对不希望子辈遭受的一种经历。

父与子的冲突更体现在对待宗教和无神论的不同态度上。韦尔西洛夫是典型的西方派,属于无神论者,面对儿子到底要不要信宗教的挑衅性提问,他的选择当然是无神论。在他看来,不信仰上帝“这是种极好的迹象”,并且认为真正的无神论者是“全世界最优秀的人”,“可尊敬的人,极可信赖,可以说是祖国的栋梁”。^{[4](285)}显然,作家是以反讽的立场戏拟了韦尔西洛夫的这番言论。正如巴赫金所言,《少年》中的父与子主题需要在宗教层面,亦即“圣徒行传和精神生活的层面”进行理解。^{[3](283)}

“复活”意味着少年的人格独立。《少年》中的自白(即忏悔录)是作为心灵的“复活”而出现的,也是主人公迈入成年门槛的最后一步,少年长大成人前夜的心理独白显示了他在心理上的成熟,而成熟的最主要标志就

是独立性,即不再依赖任何人为生,执意从自我出发,与之前一直顺从生活的惯性进行抗争,从生活上和心理上都开始走上独立自主的道路。

阿尔卡季的忏悔录是在经历了生活的种种变故和多重刺激后,在一场持续时间较长的养病过程中开始慢慢形成的。“我不省人事九天之后清醒过来,当时我只是复活,而不是好转。当然,如果就‘复活’的广义来说,我的复活很荒唐,假如这事发生在现在,情况也许就不同了。……我不想报复任何人,这一点我保证做到,——虽说我受过欺侮。我打算既不带着厌恶、也不带着诅咒离开,但我想拥有自己的力量,一种独立于他们中的任何人、独立于全世界的任何人的真正力量,然而我竟差点儿顺应了世上的一切!”^{[2](468)}这段自白式的忏悔说明少年已原谅他以前心中所记恨的人和事,决意与之前的生活一刀两断,这种诚实的悔过和要求新生的独白,就是作为心灵“复活”的独特忏悔录。

此外,把《少年》称为独特的《忏悔录》的原因,也在于少年阿尔卡季在书中的年龄界限。苏联科学院版《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指出:“作为事件参与者的十九岁的阿尔卡季和作为小说中事件叙述者的二十岁的阿尔卡季,两者之间有质的区别。”^{[2](760)}

二、“偶合家庭”里的角色与错位

正是在《少年》中,陀思妥耶夫斯基第一次提出了“偶合家庭(случайное семейство)”的概念。他在后来的回忆文章中认为,“偶合家庭”中的成员“都是社会的早产儿”。^{[1](177)}

“偶合家庭”的男主人是韦尔西洛夫,他扮演着有实无名的丈夫和父亲的双重角

色。可以说,是韦尔西洛夫一手制造了这个“偶合家庭”,引发了各个人物之间一系列的矛盾。韦尔西洛夫在一次谈话中,竟然引经据典,恬不知耻地将自己比作《圣经》中的大卫王,透露出自己霸占他人之妻的事实。“万一这个乡下的乌利亚呼天抢地吼起来,——那我这个如此矮小的大卫王会怎么样,我当时又能干什么呢?”^{[4](170)}在这里,韦尔西洛夫反用了圣经中的典故:大卫王见到了乌利亚的妻子拔示巴,便引诱了她。乌利亚猜到了这件事,就不肯回到自己的家里。于是,大卫王命令约押在作战时将乌利亚派到阵势极其凶险的战场,导致乌利亚在战斗中阵亡。之后,大卫就堂而皇之地娶了乌利亚的遗孀为妻。然而,这件事的后果是:“但大卫所行的这事,耶和华甚不喜悦。”(《旧约全书·撒母耳记下》11:27)从《少年》的内容来看,韦尔西洛夫大多数情况下都以反面角色出现,他几乎只起着推动情节发展、加强成长障碍、延缓成长速度的作用,跟《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中的瓦尔科夫斯基不分伯仲,然而,小说正是要借此表明:他们恰恰是少年成长路上不可或缺的负面典型,从他们身上获得的认知无可替代,也正是完整人生的一部分。

马卡尔作为阿尔卡季的养父和法律上的父亲,则心地善良、有洞察力,他被陀思妥耶夫斯基描绘成平民百姓中的贵族,因为他是一个真正的东正教教徒。马卡尔的受苦和自我流放与浪游之路,实质上是一条自我净化、追求真理与寻求救赎的道路。马卡尔在小说中的出场,恰逢阿尔卡季病休康复之时,也是他走向独立之路的前夜,他所讲述的经历和人生教诲,仿佛是在少年人生观锻造和塑型最后阶段上的几次捶打、抛光与镶印。

当然,阿尔卡季与马卡尔的相逢并非

一开始就如此和谐,他们也经过多重的思想交锋和反复的磨合。阿尔卡季向马卡尔坦白他既相信上帝又相信科学,而马卡尔认为人对科学的认知能力也是出于上帝的恩赐,虽然他充分理解和尊重年轻人搞科学的权利和能力,但他坚信太多的科学知识会妨碍人信神。几轮谈话下来,阿尔卡季被马卡尔朴素的宗教思想折服,表示要跟他走,一同去浪游。在这里,陀思妥耶夫斯基刻意详细描绘了阿尔卡季精神受洗后的晴朗与喜悦,如同得到了天启。“我面壁躺着,突然看见夕阳投进墙角里的那个灿烂的光斑,正是刚才我还诅咒着等待其出现的光斑。直到现在我还清楚地记得,当时一见这灿烂的夕照,我的整个灵魂顿时欢欣起来,仿佛有一片新的光明照透了我的心田。我至今记得这个甜蜜的时刻,并且不想忘怀。虽说这不过是短暂的一瞬,却充满了新的希望和新的力量。”^{[2](483)}

《少年》中的母亲角色有很多,但主要指阿尔卡季的生母索菲娅·安德烈耶芙娜。她是农奴的女儿,被父亲许配给另一个农奴马卡尔,却成为地主韦尔西洛夫未履行合法手续的妻子,并生下了少年阿尔卡季和丽莎。阿尔卡季的生母的角色很独特,她性格温顺、未婚生子,过着清苦的日子,颇似圣母玛利亚。当然,小说中更像圣母玛利亚的母亲角色,似乎应该是那个自杀的姑娘奥莉娅的母亲达里娅·奥尼西莫芙娜,她们同属柔弱而坚强的母亲,达里娅在女儿死后一直在继续女儿即使活着也被注定的人生轨迹和命运之路,像是背负着钉死孩子的十字架而踽踽独行的受苦圣母、悲痛圣母。

由于私生子身份,阿尔卡季从小被轮流寄养在韦尔西洛夫的乡下亲戚家,他记忆中几乎没有留下生父的形象,如果说有,那也是由记事起陆续听到的关于他的不好的

传闻而逐渐构建起来的。相比之下,阿尔卡季从襁褓时期就留下了他母亲的美好印象,母亲在他眼里俨然是一个温顺圣母兼凄苦圣母的形象。“我什么都不记得,什么都不知道,只有您脸上的某种神情却终生留在我的心里,此外还留下了一种感知:您是我母亲。现在回想起来,这乡下的一切就像朦胧的梦境,我甚至连自己的保姆也忘了。”^{[4](144)}阿尔卡季终生难忘母亲参与的一次宗教活动场景,仿佛圣母在教堂为圣子施洗一样。“妈妈,我记得清楚的只是在一瞬间,就是有一次在当地教堂里给我行圣餐礼时,您把我举起来受圣餐、吻圣杯的那个瞬间,这是在夏天,有一只鸽子在教堂圆顶下横飞而过,从一个窗户飞进来,从另一个窗户飞出去……”^{[4](144-145)}

阿尔卡季对母亲的记忆与眷恋,完全超过对生父的印象和认知,甚至与父亲的记忆完全对立。“您的脸,就是说,您脸上的某种神情深深地留在我的记忆里,所以五年之后,在莫斯科,我一下子就认出了您,虽然当时并没有人告诉我说您是我母亲。”^{[4](145)}在一次摔伤昏迷之际,阿尔卡季脑海里再次闪过妈妈在乡村教堂给他行圣餐礼时鸽子从圆顶下穿越飞过的场面,而且在这一次的记忆中,又增加了“绿色嫩叶”和“夕阳斜照”的特写。这些不仅增强了孩童记忆中永存的妈妈首次出场时的温柔、神圣与美好,以此象征着陀思妥耶夫斯基心中理想的、孩童成长必不可少的和谐世界和美好生活,还为她的出现浓墨重彩地铺设了跟她形象十分和谐的背景,以此给温顺而伟大的母亲形象平添了崇高而宁静的光环。但实际上,妈妈在为数不多的几次看望寄宿就读儿子的时候,大多穿着极其普通,甚至给人感觉像做苦力之人;在儿子的印象中,她不但瘦削和苍老,而且目光忧郁、神情凄苦。在寄宿学

校校长夫妇的面前,她的言行举止卑微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她不但对校长夫妇鞠躬致谢,还对自己的儿子鞠躬致歉、表达难以形容的愧疚之情,以至于在母亲跟他告别之际面对教堂为他祈祷和忍不住哭泣时,他都觉得害臊难忍。

相反,作为事实上的丈夫的韦尔西洛夫不但看透还狡猾地利用了阿尔卡季生母索菲娅善良和温顺的性格。他曾经不无正确地对儿子指出她性格中逆来顺受的特点:“恭顺、唯唯诺诺、逆来顺受,同时却又坚定有力,有一种真正的力量——这就是你母亲的性格。请你注意,她是我在世界上认识的所有女人中最出色的一个。至于她有一种力量,这一点我能作证:我见过这种力量在如何支撑她。凡是涉及到——我不是说信念,这儿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信念,——凡是涉及她们认为是信念的、从而也就被她们认为是神圣的东西,那她们简直就甘愿忍受苦难。”^{[4](165-166)}他坦言自己与她具有不同的生活方式,但认为自己无力也无意去改变自己:“即使处在对他们来说极不自然的环境里,他们也能继续按自己的方式生活,在他们极其陌生的环境中完全保持本色。我们却做不到。”^{[4](166)}当然,索菲娅也无力改变他,她只是以温顺的言行在默默地影响着下一代,与韦尔西洛夫的说教进行无言的交锋和争辩。

阿尔卡季从小缺少父爱,因此渴望父爱。由于他在寄宿学校遭到了不公正的对待,他甚至一度打算从寄宿学校逃离去找父亲。但这种要求,对于父辈而言,属于完全过分的要求。正如韦尔西洛夫的女管家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训斥少年时所说的:韦尔西洛夫当初没有把阿尔卡季送去学鞋匠,而是送他大学,结果阿尔卡季反而不珍惜以此得来的种种机会,却对父辈要求更多。这

说明父辈与子辈即使共处,他们的鸿沟还是很大,无法互相理解,空间上的亲近无法弥合心理上和精神上的裂隙或差距。

正是以上因素,让这个家庭成为一个不折不扣的“偶合家庭”。陀思妥耶夫斯基着眼于这种家庭的非道德性,批判其中的每一位成员。他说:“我选取的是天真无邪的、但已被玷污了的心灵危险堕落的可能性,因自己地位卑贱与自己的‘偶然性’而萌生的幼稚的仇恨已经沾染了这颗心灵,这颗纯真的心灵由于自己的豁达不羁而允许邪恶念头进入自己的思想并在自己的心灵中孕育它,它还羞怯,但已在大胆和热烈的幻想中欣赏它,——这一切都只听凭自己的力量、自己的理智,当然还听凭上帝的支配。所有这些人都是社会的早产儿,都是‘偶合’家庭中的‘偶然’会员。”^{[1](177)}在我们看来,“偶合家庭”的特点不仅仅在于“地位卑微”,重点恰是在于其“偶然性(случайность)”,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德不配位的错位性。

韦尔西洛夫父子的行为体现了“偶合家庭”中家庭成员的本质特性,即错位性或欠缺性,也就是说,父不像父、子不像子。具言之,每个家庭成员几乎都不完全具备理论上完整的身份特征和实际表现,也都缺乏大体一致的家庭认同感和身份认同意识,几乎每个人都在竭力高扬自私的个人主义。“利己主义取代了先前的团结观念,整体分解为个人自由。而获得自由的人们一旦撇开团结观念,最后必定失去任何崇高的纽带,到头来连自己已经获得的自由也不再能捍卫了。”^{[4](291)}在作家笔下,这种貌合神离的“偶合家庭”是资本主义进入俄国后传统的公序良俗完全失范的结果。而家庭、世风(家风)和上帝所组成的人类精神生活的基础,不但是一种文化传统,还是每个人建立自己的必要根基所必须依赖的资源,因此,

“恪守传统,对作家而言,就是对人类生活合法性的最重要的证明。”^{[5](71)}从道德和宗教角度而言,“偶合家庭”所缺乏的不是血统和亲情,而是精神纽带,从最低的要求上来说共同的道德规范,从较高的要求上来说对上帝的敬畏,即对世人共同的“父”的认同。

三、成长小说的词源学涵义

毋庸置疑,《少年》是欧洲文学史上一部典型的成长小说(Bildungsroman)。巴赫金认为,成长小说的“具体而专门的主题”就是“小说中成长着的人物形象”,^{[6](223)}并且在历史发展中出现了诸多特殊变体。从词源学上论,Bildungsroman(成长小说)来自于德语,其中的“Bildung”一词在德语中原本是一个宗教术语,“它既指‘外形’或‘外表’(Gestalt,拉丁语 forma),也指‘塑型的过程’或行为(Gestaltung,formatio)。”^{[7](1)}据文学史家贝塔·伯杰(Berta Berger)的考证,“Bildung”一词中的“Bild”最早被那些经院哲学家、教堂里的神父和虔信派教徒们用来指“上帝形象的恢复”:因为“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Vorbild, God's image)创造的,但由于人的堕落,这一形象被扭曲了;为了赎罪,人不得不通过自我检讨和反省来重塑自己的形象。这部分地说明了宗教忏悔文学和成长小说之间的渊源关系。”^{[8](17)(9)(81)}从这个角度来说,作为成长小说的《少年》,既来源于宗教的自我塑型,即在失去上帝形象后不断寻找上帝的形象,又最终走向回归宗教的怀抱,它所彰显的正是开端和终结之间东正教对少年个人、长不大的成年人个体乃至整个社会全体的救赎意义。

如果将“成长小说”如此定义的话:“从最浅显也是最根本的意义上说,成长小说就

是一种描摹个人认识自我、追寻自我过程的小说体裁,它聚焦于主人公从青少年到成年的心理和道德成长过程。”^{[9](4)}那么,主人公所认识和追寻的“自我”也是以上帝的形象作为参照的,在某种意义上说,成长小说其实也是寻父(神)论原型在确定自我意识的过程中的一种文学折射。

就完整性而言,两位父亲在阿尔卡季的人生成长和成熟的过程中起着互相观照、互为补充的重要作用,显得缺一不可。他们分别象征着上帝形象的失去和复归,阿尔卡季在他们之间不断探索的过程恰好构成了《少年》作为成长小说的原初意义。生父是少年成长的哈哈镜,在他身上阿尔卡季有时能发现两种截然相反的品质,在逐渐了解生父的过程中,阿尔卡季也有所镜鉴,复活并矫正了自己内心深处对美好品德的潜能。养父则是少年精神成长的导师,在阿尔卡季正好需要精神指导时,他以身说法地向阿尔卡季传播基督教的福音,引导他做一个具有传统正教精神的新人。阿尔卡季理解父辈,体现在既能看透生父的所作所为,又懂得养父所说的关于宗教与人生的朴素道理。阿尔卡季尤其记得自己小时候生父在一次家庭戏剧演出中动情的表演,他深知那是后者一次对人生如戏、戏如人生的角色的本色出演。“当他在舞台上独白的时候,我明白他是受了侮辱和欺凌,他是在谴责所有那些卑鄙小人,可我明白,他很了不起,了不起!”^{[4](150)}寻找亲生父亲多半是源于本能的血缘和亲情关系,而寻找自己的精神之父则是一个颇费周折、甚至要经历重重考验的漫长过程,精神皈依的难度不亚于寻找生父。

作为子辈的阿尔卡季,尽管从小在充满西方式的环境中接受法语之类的教育,却毫不忘本,反而更喜欢俄国本土的东西,

这显然是在暗喻俄国儿童本身就具备回归俄国根基的潜能。“在那儿,小姐们教我学法语,可我最喜欢的是克雷洛夫的寓言,我背熟了许多篇,不管安德罗尼科夫有没有空,我每天都径直走进他的小书房,朗诵一篇寓言给他听。”^{[4](145)}可见,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表现走向少年的阿尔卡季性格中倔强甚至叛逆的同时,更反映了作为儿童的阿尔卡季早早就显露出他的好学和多能,预示着他今后不同于生父的人生之路:他一定会真正地成长起来,长大成人,并成为俄国社会的中坚力量。

结语

小说在最后部分,以阿尔卡季在莫斯科早年的收养人的口吻,道出了作为历史小说之一种的成长小说的写作困境:虽然还可以描绘“艺术上完美的画面”、“俄国幻景的画面”,甚至“把历史的画面当作现在还可能重现的情景”,以此“把读者迷得神魂颠倒”,但是,历史小说在“流行的舆论”看来,毕竟再也“不能保持原有的美”了,因为作为新人的“当代人物”已经出现,他们都是一些“不能不写”的“厌世、孤僻并且无疑是忧郁的形象”,^{[2](751-752)}甚至是一些怪人,那么,今后的历史小说将如何再次虚构和美化这些在今天看来就都已然不美的形象呢?

这位以斯拉夫派自居的收养人的观点,部分代表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的立场。收养人认为,俄国过去的和将来的历史小说,甚至也跟成长小说一样,都存在相当程度的美化和推测,“即使要描绘逝去的一片混乱,也能找到美的形式”。^{[2](754)}这种说法跟陀思妥耶夫斯基多次构筑的“黄金时代”之梦的机制如出一辙:过去时代的美好画面几乎都是人们自我美化的描摹,所有对

过去的描绘几乎都带有对未来的理想主义想象的成分,犹如我们把流淌着奶与蜜的乐土和乐园想象得跟天堂一样;即使明知这一点,我们仍然在乐此不疲地继续这样做。所以说,《少年》的主旨在于彰显俄国东正教精神在失去与复得之间追寻与探求的思想史内涵。这也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少年》中书写“宗教与人生”思想的诡谲与魅力之所在。

参考文献

- [1] [俄]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家日记(上)[M],张羽译//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10。
- [2] [俄]陀思妥耶夫斯基:少年(下)[M],陆肇明译//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10。
- [3] Лекции М. М. Бахтина по истории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Записи Р. М. Миркиной[C] // Бахтин М. М.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7 томах. Т. 2[M]. М.: Русские словари, Языки славянских культур, 2000.
- [4] [俄]陀思妥耶夫斯基:少年(上)[M],陆肇明译//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10。
- [5] Глазкова Т. В. «Случайное семейство» как феномен культуры[M]. М.: Русский раритет, 2010.
- [6] [苏]巴赫金:教育小说及其在现实主义历史中的意义[M],白春仁译//钱中文主编:巴赫金全集(修订版)第3卷(小说理论)[M],白春仁等译,河北教育出版社,2009。
- [7] Kontje, Todd Curtis. *The German Bildungsroman: History of a National Genre*[M]. Columbia: Camden House, 1993.
- [8] Gohlman, Susan Ashley. *Starting Over: The Task of the Protagonist in the Contemporary Bildungsroman*[M]. New York: Garland, 1990.
- [9] 孙胜忠:西方成长小说史[M],商务印书馆,2020。

On the Spiritual Internal Cause of the Dislocation of Father and Son's Roles and “Random Family” in Dostoevsky's Novel *The Adolescent*

Wan Haisong

Abstract Dostoevsky's *The Adolescent* is not only a novel of the father-and-son theme and another distinctive *Confession* about the spiritual growing up of an adolescent called Arkady, but also a very important text about the ideological writing of “religion and lif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thics and religion, the dislocation of father and son's roles and the phenomenon of “Random Family” in this novel are rooted in the lack of the most basic spiritual identity, that is, the common moral norms and the fear of God. As far as the etymological meaning of Bildungsroman and the intention of the ideological writing of “religion and life” are concerned, *The Adolescent* emphasizes the ideologically historic significance of the seeking and searching of Russian Orthodox ethics between its being lost and being acquired again.

Keywords Dostoevsky, *The Adolescent*, dislocation of father and son's roles, “Random Family”, Bildungsroman

(作者单位: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